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

談《上海的早晨》

王爾齡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27)

談《上海 的 早晨》

王 爾 齡 著

5/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讀書運動輔導叢書(27)

談《上海的早晨》

著 者 王 爾 齡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廣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字數：1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3,001—16,000冊

統一書號：10078·1273

定價：(六) 0.09元

目 次

- 一 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 ····· 1
- 二 几个资本家的形象 ····· 7
- 三 工人阶级的肖像画 ····· 17
- 四 艺术特色 ····· 23
- 五 从《子夜》到《上海的早晨》 ····· 30

一 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

周而复同志的小说《上海的早晨》，是继茅盾同志的《子夜》以后又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力作。

这部作品，是写上海解放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的。并由此显示了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作者打算写四部，目前只出版了第一部。第一部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是从上海解放到“三反”“五反”的开始阶段。从已出的第一部来看，作品的社会容量是巨大的。

作者选择了上海作为小说的地理环境。我们知道，上海这个闻名世界的都市，曾经长期被帝国主义分子当作“冒险家的乐园”，被本国剥削阶级称作“十里洋场”，被目为“工业的金融的都会”；同时它又是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诞生地。上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任务，那就是对为数众多的、根深抵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一改造本身，就是一场极为复杂的阶级斗争。

这场复杂的斗争，决定了小说结构的犬牙交错的脉胳。

小說是由这样几条綫构成的：剛取得了全国政权的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与资产階級之間的矛盾；资产階級内部勾心斗角的矛盾；工人階級和隐藏在它的内部的工賊之間的矛盾；资产階級和资产階級知識分子的矛盾，以及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农村里的农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等等。自然，在以上这些矛盾中，工人階級和资产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工人階級又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国工人階級和资产階級的矛盾，在各个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解放初期，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限制与反限制，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党对资产階級的政策，是由革命的需要以及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了革命統一战綫的必要性、广泛性和它的发展的长期性。”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統一战綫，“曾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包括一切可以长期合作和只能暂时合作的階級、阶层和集团，但是，在这些非劳动人民同盟者里面有一个长期占着重要地位的階級，这就是民族资产階級。”“就在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們仍然保持了反帝爱国的立場，并在恢复国民經济和发展工业建設、发展現代文化和技术上有积极作用。”但是，他們的經济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觀愿望是为要爭取中国的资本主义前途”。^①这样，解

放以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解放初期，资产阶级自恃熟悉市场情况，自恃其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有相当大的比重，还掌握着一部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在竭力抗拒国营经济的领导，争夺市场领导权。然而正如小说所反映的，在争夺物资、抬高物价这一着上，他们已经跌了一个跟斗了。于是，他们一方面慨叹“现在的中枢神经是人民银行，我们顶多也不过算是神经末梢罢了。我们的黄金时代早过去哪。”（金懋廉）另一方面，就恶毒地组织进攻：非法组织“星二聚餐会”操纵工商界，合谋对抗政府和国营经济（例如反对棉纱等级检验），腐蚀国家干部（朱延年恬不知耻地宣称“我们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总之，他们向工人阶级展开了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进攻，甚至还以人代会、政协和企业内部的劳资协商会议作为“合法”斗争的场所。

对于在新的时期的资产阶级，党坚持执行了积极争取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论是吸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加政权，在经济上照顾他们的合法利益，或者是在劳资协商会议上的协商和斗争，与此后“三反”“五反”的展开，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这在小说中

① 李维汉：《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一辑下册。

是作了比較充分的反映的。

这种有团结有斗争的政策，实际上是体现了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精
神。这根据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即
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有其两面性：它一方面剥削工人
阶级，取得利润，希望发展或者保持资本主义（不论这种
希望在不同时期表现如何：是强烈的或者是淡薄的，公开
的或者隐蔽的，自觉的或者不完全自觉的）；另一方面，又
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这种接受是被迫
的、逐步的）”。①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它的积
极一面和消极一面的强弱程度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变
化。小说所反映的那个阶段，我们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斗
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政治上表现为对美帝国主义既
有幻想又有恐惧，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巩固性将信
将疑（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徐义德是以幻想“变天”为主导
思想）；在经济上，它的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的消极一面就表现得非常突出，他
们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了。

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关系的尖
锐化，是这部小说的主线的依据。在这第一部的结尾，胜

① 張執一：《試論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人民出版社版第100頁。

負还未分曉，然而讀者已經可以預感到局勢將向哪一方向發展。例如“三反”戰綫上對“大老虎”稅務分局駐滬江紗廠駐廠員方宇的攻堅戰，已經動搖了對方陣腳；滬江紗廠內第二次勞資協商會議已經準備，過去只對技術感興趣的工程師韓云程在事實的教育下對共產黨的政治感到“服貼”了，福佑藥房高級職員童進入了，更重要的是滬江的黨團以及外圍的積極分子力量發展了。

小說所反映的農村，所占分量並不多。作者寫了兩節補敘、插敘，來顯示農村的概貌。通過解放前湯阿英離鄉背井流浪到上海進了工廠的補敘，反映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血肉聯系；通過地主朱慕堂和資本家徐義德、朱延年的親戚關係或同族關係，徐義德的“營救”被鎮壓的朱慕堂，反映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血緣關係。寫農村，其實是為了寫城市。

小說也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除了勾心斗角以外，還寫了他們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因為本身的历史、社會、思想等因素，更因為社會主義力量的強大，他們較快地、較多地接受黨的政策，例如“二短一長”的青年資本家馬慕韓；有的因為自身的經驗而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成為被動地“守法”的“穩健派”，例如潘信誠；也還有在“誰戰勝誰”的鬥爭中準備與無產階級一決雌雄的資本家，例如“實力派”徐義德、“空頭派”朱延年；也有資產階級右翼的政治代

表,那就是馮永祥。他們所計算的,都是本階級的利益,然而,由于历史、社会、思想等因素的不同,由于对什么是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真正利益理解不同,因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現。

工人階級与工賊的矛盾,在第一部里还没有鋪开,工賊陶阿毛还没有被揭露,斗争只埋下了种子。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例如沪江紗厂總經理和韓云程、郭鵬的矛盾,是展开了的,但限于第一部所反映的历史內容,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下去。这些知識分子,有的对資本主义想有所反对,但因为站的是个人主义立場终于又向資本家投降,成了他們非法牟利的帮手,如韓、郭;有的干脆倒下了,如国家干部張科长。这里,初步地显示出,在生产資料的占有与否上,旧知識分子与一般資產階級分子是不同的,同时,“他們是掌握現代科学文化的骨干,又比較富于爱国性和政治感觉”^①,这是他們与一般資產階級分子的又一区别。但就他們的思想立場、他們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方面來說,則他們无疑地是和一般資產階級一致的。小說中的这几个人物的描繪,再一次为我们指出了这个真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必要的。

① 李維汉:《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汇编》第一編下册。

二 几个资本家的形象

《上海的早晨》所采取的是概括性描写的方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成分日益壮大，就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识了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因而基本上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一些工商业者，与革命暂时同路，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因而象盲人骑瞎马，想横冲直撞撞出个天下来，结果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周而复同志就是这样选取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对资产阶级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作了概括性的描写，合起来就反映了当时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他们的总面貌。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资金不多、剥削时间不长、意识到自己来日方长的青年资本家马慕韩，有沪江纱厂总经理、工商界的“实力派”徐义德，有稳健谨慎的潘信诚，有一肚子诡计、可以把共同纲领倒背如流、逢人敬上一支本厂烟以广宣传的唐仲笙，有靠站、拍取得大资本家信任而当了厂长的梅佐贤，有忽穷忽富、以假药欺世的投机家朱延年，也还有并无资本然而以工商界代表和“半官方”自居的工商界政客馮永祥，

以及“交际花”式的女资本家江菊霞。就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組成了解放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层。

作者着力描写的徐义德，在作品中是一切事件和人物的联结点，矛盾的焦点。

徐义德，作为实力派的代表，是目击了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变动，明白政治会影响经济的老练圆滑的资本家。当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他已筑起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上海，第二道防线香港，最后防线是纽约”。其中最后一道是早就筑好的，香港一道则是解放军渡江以后，急迫中由上海运走六千锭子去设厂而建立起来的。当时，“他无法把他所经营的企业一古脑儿搬走，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同时把棉纱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币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什么大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他现在站的很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狡兔有三窟，奸猾的徐义德凿好了三窟，就“出击”了。然而，“既有旧经验也有新经验，连外国工商界的情况也比我们熟悉”的徐义德，在新的社会里却感到毫无经验。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谁也没有“在共产党手底下过过日子”。但是，徐义德并不罢手，依然施展了资本主义的惯伎，併吞别人的产业，窃取高额利润。例如，他对制造紡織机器和紗錠的永恒厂，就用大鱼吃小鱼的办法加以併吞。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他也无所不用其极，例如拖国

家机关、企业干部下水，威胁工程技术人员为他掺入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黄花衣，攫取非法利润等。当党支部和工会发觉生活不好做、产品质量成问题，和资方开劳资协商会议时，他又把责任推到花纱布公司头上去。

他为什么这样“有把握”地“放手捞一票”呢？这是因为：“他料想中国的局面不久就要改变，……他料定共产党将来自身难保，谁还会来查沪江的账呢？”

这就是徐义德的政治态度。自然，象徐义德那样的“实力派”，对帝国主义掌握下的风云不测的市场，也不能不具有戒心，他懂得在香港市场上做黄金投机“怎么也做不过汇丰银行，这是大户中的大户，最后他通吃”，然而，他在解放前后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因此，上海一解放，他就把三百八十件纱装到汕头，把八百三十二件纱装到汉口、广州，抛出后套汇划款到香港；这和解放前的六千锭子拆运到香港性质是一样的。

这个工业资本家，使尽了各种卑劣手段，来和工人阶级“斗法”。

小说一开始，就写他和他的代理人、沪江纱厂副厂长密谋对抗工人阶级。他们的第一着棋子是“把工会拿过来”，“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是他的，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按照我们的心事办事”。他们费尽心机，让他们的走狗陶阿毛伪装积极靠拢工人，骗取工人的信任，入选为工会委员。这样，工会的意图，徐义德事先就知

道了。

对待工人，他有一套手段。在討論生活为何难做的劳資协商會議上，当支部書記、工会主席余靜指出，“主要是原棉問題”，并怀疑到配棉量上有問題时，他虽然暗暗吃惊，但表面上却很鎮靜，接着又把造成生活难做、产品质量差的原因推到花紗布公司身上去。工人因为不明真相，竟暂时給他欺騙了（这一着后来立即被区委識破了）。事后，他躊躇滿志地說：“余靜这样的黄毛丫头，究竟年紀輕，几句话一說，她就沒有意見了。”

对国家机关，他也并不放松进攻。稅局駐厂員方字，因为自己思想上有弱点，就被徐义德玩弄于股掌之上。自然，这点“小事”还不值得他亲自出馬，善于秉承他意志的梅厂长，已根据他設下的陷阱把方字俘了过去。稅务情报就不断地流到徐义德的手里。……

象徐义德那样的既有实力又有“事业心”的資本家，是不会满足于单干式的牟取非法利潤、单干式的盜窃稅款的，所以他参加了“星二聚餐会”。这个“聚餐会”是以并无产业的資本家、工商界政客馮永祥为核心的；名为“聚餐”，其实是商量盜窃国家財產、密謀对抗政府领导的非法組織。用馮永祥的話來說，“解放以后事情都要靠組織”，“聚餐会”就是“聚”集某些資本家，“組織起来”，“餐”国家資財。用徐义德的話來說，“把棉紡公会变成‘私营紡管局’，我們就有力量了”。“星二聚餐会”，事实上已經

成了棉紡公会的幕后操纵者。他們的策略便是：“依靠工商联，团结工商局，爭取紡管局，打击花紗布公司。”

我們再談一談“星二聚餐会”里的另两个资本家：潘信誠、馬慕韓。

他們同是资本家，自然有他們剝削階級的共性。可是，由于生活經歷、經營思想的不尽相同，性格也就不尽一致。

通达紡織公司董事长潘信誠，是在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无暇插手中国市場时“发”起来的。先由輕工业开始，办紗厂、印染厂，再办为自己的企业服务的紡織机械厂，又“想到中国西北部的羊毛并不推板，发展起来，中国的呢制业在世界上也可以有个地位”，便办了毛紡織厂。之后又办了麻織厂、絲織厂。另外，开了面粉厂、碾米厂。这样，只要穿衣服，只要張口吃飯，总得照顾他的生意。“穿衣吃飯是人生两件大事，办这种实业，沒有风险，利潤也厚，并且也可以替国家爭口气。他相信发展实业是可以救国的。”这就是說，他在設厂牟利除了想发财，还想“实业救国”。我們不能不承认他还有某些爱国心。上海解放后一度逃往香港。在党的对待民族资产階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终于“回来和几个儿子一道办厂”。以上的生活道路，决定了这个人物的性格：一方面，拥护共同綱領，另一方面，又想在新社会里多扒一些。等到他在一次粮食投机中受到打击以后，“他再也不敢隨便向市

場上伸手，凡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說的話，他知道，一定要照办，工商界只好拥护。有时他并不完全甘心，就不大表示什么态度”。所以，在“星二”的資本家中間，他是比較“老成持重”的，对年輕后輩的“輕举妄动”，他是“看不順眼”的。这是老一輩的具有爱国心的資本家的形象。他的处世态度，总是这样：不得罪別人，对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也不愿意放弃。对党和政府，他不敢采取徐义德那样的态度。例如，徐义德主張“全部把商标扯掉”，用以抗議花紗布公司的棉紗等級檢驗，潘信誠的看法就“平和”一些，主張心平气和地研究一个办法。潘信誠的“老成持重”，决不能仅仅从他年齡、个性上去找解釋，而應該这样理解：首先是因为他明白地感到党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的无可抗拒的强大。

馬慕韓是小說中最年輕的資本家。“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还不到两年，滿脑子尽是些远大計劃和个人的抱負，他不甘心局处在一个十万紗錠的紗厂里。他自己常說：希望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由于他“两短一长”（資金不多，剝削時間不长，来日方长），“在党与政府的教育下，他确实比一般資本家进步快一点”。然而，他的进步，他的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政策法令，“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同政府和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这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两面性。这是另一类型的資本家形象。

小說还着重写了另一个资本家：朱延年。小說中的徐义德是已经发了迹的人物，朱延年则正在使尽平生气力，用尽卑鄙手段，要取得徐义德那样的经济地位。

如果说，已经爬上大资本家地位的徐义德，还要戴上守法的假面，那么还没有爬上去的朱延年，则连这样的假面都不要了，他更加赤裸裸地露出了剥削阶级的丑恶面貌。

朱延年在工商界既无实力，又无地位。然而，他会冒险。解放前，他靠了一点妻财，白手起家設立了福佑药房，虽然他并不懂得西药。在当时，他确实算是懂得经商三昧的。他吃了月息五分的暗息轧进头寸，“在市场上做空头，投机倒把。他对行情看的相当准，市场的规律也摸的熟，只要把伪法币伪金圆券变成货，那一定赚钱。利息和物价赛跑，怎么高的暗息也追不上物价，做西药更是笃定泰山。朱延年的生意日渐扩大，写字间扩大，职工增加，在重庆和广州两个地方設了分号，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只有两个伙计，給上海跑街接头。他成了西药界一名红人。”这是朱延年的发迹史。

然而，“好景”不常。当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矛头指向上海时，交通断绝，银根抽紧，朱延年过去开出的五万多支盘尼西林的抛空账单到期了，既无货又无钱，头寸轧不进来，于是宣告破产了。